

福音！文化！国度！

创刊号
2024年11月

传承



传承



《福音！文化！国度！》

创刊号 · 2024 年 11 月

中国福音会发行

CMI: P. O. Box 40489, Pasadena, CA 91114-7489, USA

总 编：赵享恩

编辑团队：赵钟越娜、陈渔、雅碧、何任、谭建美

美 编：熙颜、慕玲

目录

1 编者的话 / 1
本刊编辑部

2 发刊词 / 3
赵享恩

赵天恩的“三化异象”之由来和阐述：
“为了福音”的神学与实践 / 6
3 英善

亟待更新的情感与友谊：
访谈温哥华维真神学院的创校院长侯士庭博士 / 24
4 何任

5 一位江苏的忠仆 / 32
雅婴

心怀大爱，敞开家门：
一位跨文化宣教士的故事 / 38
6 萝斯玛丽·米勒

7 征稿启事 / 47
本刊编辑部

编者的话



感谢赞美主！酝酿了近一年的《福音！文化！国度！》的创刊号，在中国福音会北美区会众同工的努力下，终于出炉了！

关于这个新期刊的缘起和使命，本会会长赵享恩博士在本期“发刊词”中已经详细介绍了。

一言以蔽之，面对全球化带给中国及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时，中国福音会北美区会当仁不让的职责乃是：我们将努力分辨神主权如何临在这个世代，以及跟随神继续带领本会的脚步。

在投入中国宣教四十余年后，本会希望这个期刊，作为中外教会领袖和同工们反省、实践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的平台，为联结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对接中国宣教与普世宣教，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然而，新时代领受新使命，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经验不再有用，完全弃旧迎新。事实上，每踏出的一个新脚印，都奠基于所沉淀的过往果实上。因此，《福音！文化！国度！》以“传承”这个主题开篇。本期有四篇文章：

1. 英善，〈赵天恩的“三化异象”之由来和阐述：“为了福音”的神学与实践〉介绍了“三化异象”。
2. 何任，〈亟待更新的情感与友谊：访谈温哥华维真神学院的创校院长侯士庭博士〉，展现了历代圣徒对三一神的炽热爱情。

3. 雅婴，〈一位江苏的忠仆〉见证了中国教会为主背负十字架的精神。
4. 萝斯玛丽·米勒，〈心怀大爱，敞开家门：一位跨文化宣教士的故事〉，近百岁高龄的她流淌著西方宣教士向不同文化、种族的百姓传扬耶稣而慷慨奉献的精神。

当然，“传承”是为了继往开来，而非故步自封。诚如侯士庭博士在访谈中指出的，“如果说十六世纪教会需要宗教改革来更新大家的思想，今天的基督徒则需要更进一步在情感上的改革，即从内心体会神的爱，从而带来情感上的更新，尤其是由心而发的感激之情”。愿这位既是神学家又是属灵导师的前辈发出的肺腑之言，深入我们这些后辈的心中，鞭策我们在欢喜传承圣徒先贤们留下的属灵遗产的同时，培养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更中，洞察神的作为的能力，好紧密跟随主耶稣的步伐，在圣灵里不断更新心思意念，深化对神的爱慕，以活泼有力的生命向当今世代见证福音的大能。

发刊词

☞ 赵享恩¹

今年，是本会创办人赵天恩牧师过世廿周年纪念，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位曾经陪伴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兴办华人神学院不遗余力、引领中国兴起宣教的先驱呢？他创立中国福音会时，总结“三化异象”为中国教会应努力的方向，他在世时呼吁“三化异象”，当时响应者尚少，廿年后“三化异象”已被许多华人教会认同，但如何落实“三化异象”，无论是从历史的脉络中梳理轨迹，或是努力眼前的策略、前瞻未来方向，如今都是刻不容缓的时机。因为这廿年全世界都经历剧变。

我们回想赵天恩牧师把握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在香港开始“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并出版《中国与教会》等。我相信全球许多参与中国宣教的教会和差会、机构甚至是观察中国的学者，都曾经参考过这本杂志。现在我也期许《福音！文化！国度！》将会更上层楼，帮助读者对中国宣教有更多的认识，因为现在已经

到了“福音出中国”的时机。

当前的处境：全球化带给中国教会的机遇与挑战

近二十年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令被孤立了近七十年的中国基督徒终于得以透过智能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等通讯管道接触海外教会。海内外教会的接触，本是教会走向国度化的一个好征兆，然而由于下列的原因，目前碎片式、间断性的接触，不仅难于推动教会的国度化，反而可能成为其拦阻：

1、中国对网络的严控变本加厉，近年一系列的互联网法规令基督徒越来越难翻过互联网上的防火墙，获取国外教会的信息和资源。越来越多的中国教会用于网上课程的 Zoom 账号也被吊销，且国外注册的 Zoom 账号也禁止在中国使用。与此同时，该政府透过窃取网上报名信息，

1. 赵享恩博士自 2004 年起担任中国福音会美国区会会长至今。这二十年来赵博士与其夫人赵钟越娜女士作为中国福音会的宣教士活跃在中国及东亚的宣教工场上。目前，赵博士夫妇及其同工等正在撰写已故的中国福音会创办人赵天恩牧师的传记。



旧金山“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成员中国领事馆前抗议中共河南当局迫害基督徒（刘贻提供）

竭力阻止中国基督徒出国参加各种特会。如针对今年秋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洛桑世界宣教大会，国安等部门大规模警告家庭教会不可以派人参加。而针对曾经到泰国、韩国或香港等地参加过特会的基督徒，返国后被找去问话的不占少数。很明显，中国政府意在完全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将基督教会沦为服务其极权意识形态的工具。

2、由于网络封锁及语言的限制，中国教会对外海教会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对非华语教会的接触与认识甚少，然华人教会在普世教会的比例极小。缺乏认识和接触文化多元、民族丰富的普世教会，这使中国教会不易有国度的心胸和眼光来拓展神的国度。也容易陷入以偏概全、将某个宗派的神学、牧养和教会治理模式绝对化，从而与其他教会疏离、甚至敌对，使得本来就山头林立的中国教会更加分化，不仅国度化举步维艰，传福音的能力也容易越来越弱化。

3、由于只有少数的机构报导中国的教会情况，使普世教会对中国教会也无法

产生全面的认识。如对中国教会的认识仅停留在受政权迫害的层面，至于对中国教会内在属灵生命的动态和牧养状况所知有限。中共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固然是令人心痛的事实，但中国教会最大的危机却不一定来自外在的迫害而是自身健全与否，尤其教会领袖若属灵生命不成熟，缺乏牧养心灵的能力，将难以胜任牧养千万破碎的家庭，特别是当前这个在内卷和躺平的两极中摇摆不安的年轻世代，更遑论展开有成果的宣教、社会慈善或公义等其他事工。海外教会对中国教会认知上的模糊，严重影响了他们制定正确的中国宣教策略，难以提供切合中国教会真正需要的帮助。

中国福音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宣教的全球化视野

全球化不仅带给中国教会机遇和挑战，也同样给中国福音会机遇和挑战。如赵天恩牧师“三化异象”的传递，四十年来已有许多华人教会及中国教会响应。我

们可以借助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将中国教会传承与落实“三化异象”的经验和成果，真实且立体地呈现给普世教会，启发世界各处的教会都在各自文化、族群的背景下展开“民族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的进程，使得“三化异象”成为华人教会对普世教会的祝福和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福音会可以依托过去四十年所积累的普世教会联系网络和资源，透过传统文字、网络多媒体等多种渠道，将普世教会在福音化、基督化和国度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介绍给中国教会，深化对“三化异象”的理解和落实。尤其在国度化层面，不只着眼于中国教会自身的联合，更是迈向与普世基督教会的联合，在这末世时代，对抗文化世俗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政治威权主义的黑暗力量，调动所有神的百姓的积极性，拓

展神的国度，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然，中国福音会也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是否愿意跳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宣教熟悉的框架，以全球化的视野及末世观的神学意识，探索一条连接中国宣教和世界宣教的新路？

中国宣教全球化的尝试：为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提供直接交流的平台

针对以上全球化带给中国教会和中国宣教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在此提出创办一个以中国社会、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为研究、交流对象的杂志，为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提供直接交流的平台，作为中国宣教全球化的尝试。



赵天恩的“三化异象”之由来和阐述： “为了福音”的神学与实践

英善¹

赵天恩的“三化异象”，最先于1985年7月在台湾“青年宣道大会”（下称青宣大会）中被完整地提出来；² 赵氏其后继续在不同的渠道发表“三化异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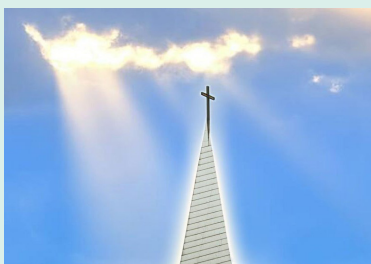
的内容。1990年，在台湾中国福音会同工会及基督书院策略性规划的讲稿中透露，赵天恩对“三化异象”有以下的简介：³

“中国福音化”



向95%以上没有信主的中国人传福音，就是包括了向大陆同胞们传福音。

“教会国度化”



以上帝的整体救赎工作为事奉的大环境、总路线；主要是针对教会或机构因为容易出现“自我本位主义”，而忽略了上帝在历史中救赎计划的长远主流这个问题。

“文化基督化”



以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及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以此主领中国文化。

1. 作者现于神学院教授系统神学，以及在教会担任顾问牧师。曾在香港接受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的装备，并在北美的神学院获颁神学博士。英善在大学时代，便领受服事华人的异象与负担。在接受神学教育初期，即深受“三化异象”感动；个人深信，基督的爱与救恩能为个人、为教会、为民族带来更新和转化。
2. 王嗣岳主编：〈赵天恩生平年谱 1938-2004〉，《2014 第一届赵天恩学术研讨会》（台北：赵天恩档案中心，2014），85。
3.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未发表文稿，50-1。

赵天恩的异象不能与他个人的阅历分割，事实上“三化异象”的由来与他个人的蒙召经历有著密切的关系。以下将先介绍“三化异象”的背景，再逐一论析赵氏心中的“三化异象”。

（一）背景

在阐述“三化异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赵氏以他人生的七个呼召⁴作为叙述的重点。赵氏14岁清楚得救，15岁奉献传道，从此传福音的热忱从未稍减，对真理的热爱和追寻亦与日俱增。至于对远东的福音负担，赵氏自言在神学院二年级时，就确定了回到远东、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这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熏陶”，同时也是有感于中国人对福音的需要。⁵赵氏总结其呼召的三个背景因素：1. 对真理的热爱；2. 爱国主义的熏陶；3. 领人归主的热忱。这些背景因素促成了他的异象，产生了积极的行动；在行动和各种经历里，赵氏的异象和呼召变得越来越清

晰。透过长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以及亲身参与中国事工，赵氏对中国的负担亦日渐加重。

对赵氏而言，个人呼召需要以行动来响应，然后透过呼召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异象便会越见清晰。就好像他领受传道的呼召后，便以“入读神学院”为行动的响应；领受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呼召后，便回到台湾教学，认识华人教会及神学院。在这些行动中，赵氏越来越确认，若要中国人认识福音，并且被基督信仰影响，教育有不容忽视的庞大力量！高等教育可以让大学生认识福音信仰和价值，毕业后就可以影响社会；而神学教育则可训练成熟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继而能建立基督教大学。在赵氏往后的服事中，神学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⁶而在主办神学教育的背后，赵氏不只是期望毕业生在教会牧养和服事少数已信主的信徒，而是要训练一些像他一样，带著热诚去传福音的人，使更多未闻福音的人可以听到福音。此外，他更期望这些被培育出来的神国工人，生

4. 七个呼召分别为“传道”、“回远东向国人传福音”、“中国神学教育”、“研究中国及大陆教会”、“大陆福音工作”、“为中国福音化展开神学教育”、“文化基督化”。见〈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中国与教会》83(1991年5-6月)。

5. 在赵氏发表的文章〈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中，他以“爱国主义的熏陶”来表达个人异象的背景，然而在他的讲稿大纲中〈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他却以英文“sense of Chinese need”来表达。

6. 赵天恩有关的学院/神学院多达六间，包括：创办中国神学研究院，担任教务主任(1975-1980年)、担任中华福音神学院教务主任(1970年)、创办中国宣道神学院，担任院长(1987-2000年)、帮助道生神学院复校，担任院长(1988-1989年)、担任台北基督书院院长(1989-1992年)、创立中福神学院(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1年)。参〈赵天恩生平年谱 1938-2004〉。

命被基督信仰转化，当他们在社会中生活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被转化。从这些办神学教育的目的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赵氏的“福音化”、“国度化”和“基督化”思想。

赵氏常以行动来响应呼召，可说是一名行动派；他知道在实践行动之中，异象会越来越清晰。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不重视理论，学术研究对他来说，亦是实践异象的重要环节。他自言：“参与福音工作，不单单是具体的实地去作，而且在理论层面上，也要去作，甚至去争战，进行神学思想的护卫，差传思想的斗争。”⁷ 赵氏的异象重点是“为了福音”，然而若要福音真正被中国人明白，就不能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宗教政策、三自和家庭教会的情况、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他先后建立不同的中国研究中心，⁸ 开启了中国教会的窗户，让外界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认识。不但如此，赵氏对



中国文化、国情和教会的研究，更成为国内教会重要的属灵支持。⁹ 他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对于“文化基督化”的实现，也有著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福音化¹⁰

1. 异象的促成

中国福音化的异象，无可否认，是源

7.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扶我前行》，16。

8. 赵氏曾建立的研究中心，最早期有在费城设立的“基督教研究中心”（1969年），其后在香港设立“中国教会研究中心”（1978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本为中国神学研究院（中神）属下的部门，1980年从中神独立，1994年易名为“中国福音会”。1986年他在台湾又设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一年后易名为“中国福音会”。1998年他在台北成立“中福神学研究所”，旨在培育基督教与中国研究的师资人才。参〈赵天恩生平年谱 1938-2004〉。

9. 赵氏离世时，家庭教会领袖皆大为震惊和哀恸，除了因为赵牧师与家庭教会忧戚与共外，相信更是因为赵牧师在家庭教会领袖遇到各样教会问题时，提出过许多关心和指导；故此，得闻赵牧师返回天家的消息时，立时哀叹：“以后有难去问何人？”见《灵火淬炼 赵天恩牧师纪念特刊》，21。

10. 与“中国福音化”直接有关的文章，赵牧师曾撰写的包括：〈吾土吾民—中国福音化异象〉、〈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异象〉、〈十亿灵魂的挑战〉、〈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以上文章



自于赵天恩个人对传福音的热忱！在他领受呼召、奉献传道时，他自言“神让我看见：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传福音。”¹¹而这个“看见”是“灵里的看见、内心的看见、信心的看见”，经过回应、跟从、坚持后，变得越来越清晰；也不唯独他一人看见，神也让其他弟兄姊妹看见，对这异象也就有了共识。¹²除了个人对传福音的热忱外，作为中国基督徒，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也推动了“中国福音化”异象之发展。在〈十亿灵魂的挑战〉一文中，赵氏指出自1843年即“五口通商”次年，有关中国福音化的宣教策略，都只在西方宣教士圈内讨论；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这也成了华人教会必须思考的课题。身为中国基督徒，面对十亿同胞尚未得救的事实，我们是责无旁贷的！¹³

除了个人原因外，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状况，亦客观地显明

皆收录在《中国与教会》期刊，亦可见于《扶我前行》（台北：中福出版，1993初版，1998二刷）。另外，有关“中国福音化”的研究文章包括麦炳坤：〈赵天恩“三化”思想论释（一）：中国福音化〉，《中宣文集》5（2005年），25-50。

11.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扶我前行》，10。麦炳坤亦指出，赵天恩经常向朋友、陌生人传福音，鼓励对方信主；他很喜欢跟人“谈一谈”，对于未信耶稣的人来说，“谈一谈”就是谈福音了。见麦炳坤：〈赵天恩“三化”思想论释：中国福音化〉，27。
12.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中国与教会》83（1991年5-6月），13。
13. 赵天恩：〈十亿灵魂的挑战〉《扶我前行》，57。

了“中国福音化”的必须性。五十年代不少中国青年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但后来的社会运动，却让一群中国知识分子满腔的热诚化为乌有；文革的惨痛经历更对那一代人造成无法治愈的伤痛……数十年来，两代的年轻人也经历著信仰的危机和精神虚空，昔日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的科学和自由主义思想，甚至一度以为是社会希望的马列毛思想，都无法为他们的人生带来出路。中国青年羡慕西方的人权和法治思想，却忽略了这些人权和法治思想其实是源自于基督信仰。故此，对赵氏而言，只有福音化和基督化才是当代中国人的出路，足以恢复失去了的民族尊严，甚至可以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重新整合支离破碎的社会。¹⁴更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赵氏透过历史发展的分析，相信神正在开启中国大陆福音的门，他相信随著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政体制也会慢慢改变，他甚至乐观地期待在这开放的浪潮中，家庭教会的福音工作也有可能成为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面对巨大的属灵收割，海内外的教会实在需要作出准备，为主收取庄稼。¹⁵此外，赵氏亦指出，



内地教会虽经历许多政治压力，但基督徒人数却没有减退，上帝不断地祝福内地家庭教会，让人们在福音里找到了中国的新盼望！一群愿意为福音缘故牺牲自己的游行传道人和家庭教会负责人，可以感动更多国内外的信徒，更积极参与中国福音化的工作。再者，国内教会资源缺乏，也“逼著”国外的人与他们分享各项资源，支持福音化的工作。¹⁶

对赵天恩来说，“中国福音化”就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福音化，这不仅是身在国内的中国人民，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八十年代，据赵天恩的估算，全球有十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口，但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尚未闻福音！¹⁷赵氏形容中国社会仍处于“基督化前的社会”，¹⁸中国

-
14. 赵天恩：〈吾土吾民——中国福音化异象〉，《扶我前行》，47-48；〈十亿灵魂的挑战〉，《扶我前行》，58-60。
 15. 赵天恩：〈十亿灵魂的挑战〉，《扶我前行》，63。
 16. 赵天恩：〈吾土吾民——中国福音化异象〉，《扶我前行》，48-50；〈十亿灵魂的挑战〉，《扶我前行》，60-62。
 17. 赵天恩：〈吾土吾民——中国福音化异象〉，《扶我前行》，46。
 18. 赵天恩：〈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异象〉，《扶我前行》，51。

基督徒仍处于福音化的前期 (Pre-Christian era)。¹⁹ 若要进入到福音化的后期，让中国社会成为基督化后的社会，就必须先广传福音，让中国人首先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们才可以在社会中实践基督信仰的价值，继而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社会。这牵涉了一个历史的时序，先有量的发展（中国福音化），继而透过教会产生质的发展（教会国度化），最后基督福音的影响才能在社会中得到扩展（文化基督化）。²⁰ 由此来看，福音化乃是国度化和基督化的大前提；若没有福音化，也难以继续发展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

2. 异象的实践

赵天恩常以行动来响应异象，并且相信实践行动不但可以推动异象，也可以令异象更清晰！1983-2001 年间，赵氏经



常亲赴内地访问、考察、研究，更积极投入国内教会工人的培训，训练国内教会同工，承担传福音的使命！²¹

有关中国福音化的实践，特别针对海外人士而言，他提出好几个重点，这亦是八十年代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首先，要为中国福音化祷告，为中国领导人祷告，也为内地信徒祷告；祷告的过程会驱使人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有更多的认识。第二，为国内教会信徒提供各项属灵资源，如携带和送赠圣经和属灵书籍，以“空中神学”广播方式提供牧养与培训。第三，呼吁基督徒借投资、教授科技课程等，对内地现代化提供直接的贡献。²²

另一个实践福音化的行动，乃是透过神学教育。赵氏所指的神学教育，并非只是为了牧养教会信徒的牧师，而是要以宣道为导向。学生本身需要有传福音的负担和呼召；神学训练中需要包括圣经真理的学习，让学生对基督救恩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应用布道之中；另外，也需要有属灵操练，好让学生在实践广传福音异象时，满有成熟的属灵生命和力量；学生还需要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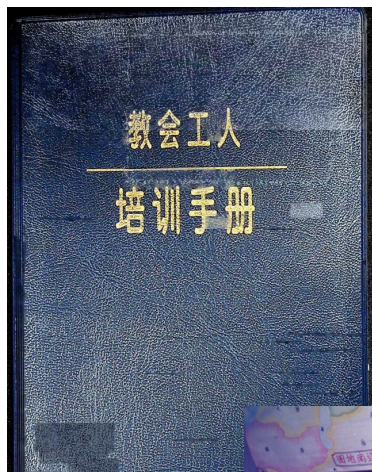
19. 赵天恩：〈十亿灵魂的挑战〉，《扶我前行》，65。

20.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事奉基础〉，《扶我前行》，31。

21. 陈渔：〈赵天恩牧师行述〉，《薪尽火传》，280。

22. 赵天恩：〈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异象〉，《扶我前行》，52-54。

更有效地向中国人传福音。²³ 以宣道为主导的神学教育，亦为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台湾道生神学院的办学宗旨。这种与神学教育相关的培训，对国内教会、对福音化也有著直接的影响。后来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重点，亦由研究、教导，转向培训工作。²⁴ 《教会工人培训手册》正是为国内福音使者和牧者所预备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圣经与救赎”、“释经学”、“基本神学”等内容，期盼透过培训课程，装备教会同工，广传福音，教会得到坚固，信徒生活更能全面基督化。²⁵ 有关“三化异象”对神学教育的涵义，本文第四部分会有详细的讨论。



3. 异象的涵义

当被问到“福音化”的实质是什么时，赵天恩确实地指出：“福音化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并认识基督，这过程就是福音化。”²⁶ 他更提到，福音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个时代能完成，却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努

力，让更多中国人能有多听福音的机会。而且，福音化也不只是停留在“传”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让福音影响到社会、文化和政府制宪精神，这过程是不应停顿的运动，直到主再来。

对于赵天恩来说，中国福音化不只是一个呼吁人们广传福音的运动，这异象对差传、对神学教育皆有重要的涵义。

福音化呼唤人们对中国大陆有态度上的转变，不再对她置之不理，反要视她为上帝所爱的对象。随著这种态度的转变，差传观念亦需要更新：过往差传常指向跨文化宣教，却忽略本族同胞的福音需要；过往以西方教会为



23. 赵天恩：〈从异象到课堂〉、〈从宣道使命再思神学教育〉、〈中国福音会神学教育方针〉，《扶我前行》，81-83，86-88，90-91。

24. 赵天恩：〈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扶我前行》，68。

25. 赵天恩编：〈总序〉，《教会工人培训手册》(Pasadena: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995)，II。

26. 赵天恩：〈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扶我前行》，68-69。

主导的差传事工，亦需要更新，发展出一套以华人角度去看差传的新路向。而在神学教育方面，过往神学教育多集中训练城市中产阶级教牧人员，并且以西方神学教育模式为主；惟福音化却重新唤醒训练布道人才的需要，那就是说，神学教育培训的学生，不只是为了牧养百分之五的信徒，而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五尚未闻福音的同胞，让他们得享听闻福音的机会。当人们体认到福音化的重要性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态度也应当改变，不再囿于教会小圈子里，而是看信仰为社会的核心，并要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赵氏相信，上帝的国度超乎人间拥有政权，基督救赎亦要在上帝的主权下临到中国历史之中！福音化带来量的发展，而当地上的教会按著上帝心意而行时，同时亦会带来质的发展。让上帝国度在地上彰显，这正是“教会国度化”异象。

（三）教会国度化

1. 异象的促成

在赵天恩的著作里，有关“三化异象”的讨论，以“中国福音化”和“文化

基督化”为多，“教会国度化”的讨论相对较少；甚至可以说“教会国度化”的观念，是较后期才出现。在1985年7月青宣大会前，赵天恩谈及异象时，都只是提到“中国福音化”和“教会基督化”：“为了中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我们需要一块地，来发展神的事工。”²⁷可见最初在赵氏的思想里，先有“福音化”和“基督化”的观念：“福音化”指由未认识耶稣福音，至成为信徒；而“基督化”则是以基督信仰为思想、行为和生活的原则与指标，故此这可指个别信徒的基督化，教会群体的基督化，以及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基督化。²⁸事实上，即使在后期的“三化异象”著作中，赵氏亦较多提到“中国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赵氏在谈到七个主导著他异象发展历程时，第六个呼召就谈到“为中国福音化展开神学教育”，而在第七个呼召，谈到本色化问题、信仰与文化问题时，“文化基督化”亦是一个主要讨论焦点。²⁹至于“国度化”的观念何时出现？尤其是“教会基督化”何时变成“教会国度化”？这点似乎在赵氏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说明；只可以说在1985年7月青宣大会中，赵氏正式提出“教会

27. 赵天恩：〈迁居感言——中国宣道学院的前景〉，《中国与教会》，39（1985年2月），2；亦引见于麦炳坤：〈赵天恩‘三化’思想论释（二）：教会国度化〉，《中宣文集》6（2006年），168-169。

28. 亦可参赵天恩：〈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异象——中国福音化与中国文化基督化〉，《中国与教会》44（1985年7月），2-3。

29.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6-17。

国度化”的异象，将其与“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并列。³⁰

“国度化”的观念，相对于“福音化”和“基督化”的观念，似乎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麦炳坤在论释“教会国度化”时，便指出好些英文翻译似乎未能将这观念的精髓带出来，甚至当赵氏初提出这新创名词时，中外同工都未能完全掌握它的意思。³¹ 若然要作出推敲，或许可以先从“中国福音化”和“中国教会基督化”作为起始点，而教会观亦成为一个重要理解关键。正如前文所述，“基督化”属于一个较为广泛的观念，可应用在个别信徒、教会，甚至整个国家社会文化；而教会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特、被拣选的群体，其思想、行动亦理应以基督为首，并且在世界中成为重要的见证，推动社会文化的更新，朝向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故此，对于教会来说，其本身不单要“基督化”，还要带著独特的使命，在世界中彰显上帝的主权，而上帝的国度亦透过教会得到扩展。故此，若要以“福音化”走向“基督化”，教会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当教会在地上彰显上帝的国度时，亦同时带动著整个社会走向基督化。或许，正因如此，教会需要“国度化”。

教会在地上彰显上帝的国度，同时亦在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赵天恩自言从新约圣经研究中，³² 得出上帝的救赎旨意：

“在基督里完成的救赎工作，要人信主悔改归向祂。”³³ 而教会就要将自己的使命，放在上帝的救赎历史计划之内，并努力参与在其中；故赵氏在“三化异象”简介中，亦指教会国度化就是“以上帝的整体救赎工作为事奉的大环境、总路线。”³⁴ 深受改革宗思想影响的赵天恩，确定人类需要被救赎；始祖犯罪堕落后，人内在性情改变了，与上帝的关系也改变了，甚至整个宇宙世界的秩序都改变。³⁵ 然而上帝却预备了救赎计划：“由圣父计划，圣子执行，并由圣灵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³⁶ 上帝的救赎历史，自亚当堕落开始便展开，直到基督再来，才完成整个救赎计划，而教会在地上带著使命，在上帝的主权下亦参与在这救赎计划内。³⁷

赵氏的教会国度化观念，其中包含力

30. 赵天恩：〈中国未来的属灵工程〉，《信仰与生活》，143 (1985年7-9月)，155。

31. 麦炳坤：〈教会国度化〉，165。

32. 这很大可能就是指赵氏对罗马书五至八章的诠释。

33. 赵天恩：〈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扶我前行》，70。

34.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1。

35. 赵天恩：《救恩神学》(台北：橄榄，2016)，62-63。

36. 赵天恩：《救恩神学》，70-71。

37. 赵天恩：《救恩神学》，242。

抗山头主义的教会观。如果教会明白自己的角色，乃是参与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之中，就不会将事奉局限在“堂会的建造”上。³⁸ 赵氏看到许多国内教会的情况，对于教会难以做到“同归于一”有著深刻的体会。他指出国内教会非常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告白，共同寻找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表达模式，教会才不会轻易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过去的中国教会，因著西方宣教士的影响，曾出现宗派林立、四分五裂的情况。虽然后来已慢慢脱离西方的宗派主义，但却仍然存在很多派别和派系，派别之间互不接触，甚至互相指控，赵氏明言这实在有违圣经中“同归于一”的教导。故此，他提倡在许多神学争议中，特别是一些圣经没有明确说明的议题上，需要找出问题关键，只要各人在关键的问题上持相同的看法，各人便可以按著自己领受，同时也要包容别人的领受，不伤和气，在主里面一同合作。³⁹ 由此可见，教会国度化的出现，实在与中国教会状况有关，同时亦是普世教会必须关注的。

2. 异象的实践

正如上文所述，在赵氏的专文中，有关“教会国度化”的讨论不算多，亦没有直接言明如何实践“教会国度化”。不过，教会国度化既以教会为核心，教会国度化的实践亦离不开教会的事工和信徒的培育。赵氏在国内的服事以培训和研究为主，他亦亲自创建了不少的神学院，相信这些都是“三化异象”的重要实践。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于1985年9月开办门徒训练课程，培训中心的主任指出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和显明上帝的国。教会若缺乏天国意识，就如身体没有了灵魂；然而，没有教会，天国亦难以在世界中被彰显；门徒要带著天国意识在地上生活，让教会成为天国的群体。⁴⁰ 此外，1988年赵天恩亦接受基督书院的邀请，担任该学院的院长，在他个人的回顾中，他视此行动为“使之成为落实三化异象的基地。”⁴¹ 当时他期望一步一步地在基督书院建立大学部、神学部及中国研究部，一面训练人传福音，一面训练人牧会，另一面训练人才做文化工作，借此回

38. 赵天恩：〈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扶我前行》，70。

39. 赵天恩：《救恩神学》，223-224。赵天恩以“千禧年”的议题为例子，各人按著不同的圣经根据，自成一家，但在众多不同的看法中，只要大家确信主的再来，有关千禧年的各项细节，各人便可按著自己的领会去接受，也要包容别人按照他们的领会去接受。

40. 陆向荣：〈作个天国的门徒〉，《中国与教会》47(1985年10月)，11；引自麦炳坤：〈赵天恩“三化”思想论释（二）：教会国度化〉，170。

41.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5。

应“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这三大异象。⁴²由此可见，建立神学院，培育门徒，让门徒、教会传道人带著天国的意识，在地上彰显上帝的国度，这些都是“教会国度化”的实践。

3. 异象的涵义

“教会国度化”的重要涵义，在于给予教会一个宽广的视野，不拘泥于本位主义，囿于个别堂会的需要，却以基督救赎历史为事奉的大环境、总路线。事实上，神在实践祂的救赎计划时，已兴起了不同群体，他们按著来自上帝的不同召命和恩赐彼此配搭，共同建立神国。赵氏指出，“教会若清楚了神的这一旨意，就不会将事奉放在本堂的建造上，而是参与神在历史中的救赎工作。教会在这件事的行动与概念称作教会国度化。教会要将自己的使命，放在神在历史救赎计划当中参与之。”⁴³其实，对现今教会来说，教会国度化的异象尤其意义。教会要打破堂会与堂会之间的藩篱，不以自己堂会的需要为重，而是以上帝的救赎历史计划为核心；这种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并非那么容易达到。教会事工的发展并不只是为了增加自己堂会的人数，教会的资源也并不只

是为了培育自己堂会的牧养人才，却是要将教会的工作放在神救赎历史的过程中，正如赵氏形容“不是打圈子，不要科学化，而是要朝向主再来的模式。”⁴⁴

在香港，有好些资源充足的宗派教会，愿意以自身宗派的丰厚资源，资助不同神学院的神学生，被资助的神学生亦不必因此而对该宗派教会有任何回馈，或许这就是一个教会国度化的美好体现！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赵氏的教会国度化，由始至终，皆是以上帝的救赎历史计划为中心，故此教会国度化并非只是指“资源分享”，或“宽广的胸怀视野”，若果这一切的行动无法叫教会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之内，那么这也不能称为“教会国度化”。



42. 赵天恩：〈走过感恩岁月〉，《扶我前行》，109。

43. 赵天恩：〈中国宣道神学院与中国福音化〉，《扶我前行》，70。

44. 赵天恩：〈中国文化的未来与福音的关系〉，《扶我前行》，191。

此外，教会国度化是以“朝向主再来”的模式进行，主再来的盼望乃是教会
在世界见证上帝主权的重要动力。不论信
徒或教会，在信仰实践之中，总会经历许
许多多的考验；在神面前的信心亦需要培
育，以致我们在经历考验时，能有充足的
属灵能力面对。教会国度化包含著“终
末盼望”，这成为了信徒和教会在世作见
证的重要基础，也是信徒在走天路时彼此
支援的力量泉源；正如赵氏所言：

只有当你看见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
救赎计划时，你才能找到自己的定
位，才有事奉的动力。人会跌倒、
软弱、失败，但上帝永不跌倒，耶
稣总不软弱，祂的救赎计划永不
失败。当我们把盼望放在基督身上
时，我们就能看见别人软弱时我有
责任扶一把，自己软弱时能在主里
面得安慰得刚强，更不会因人的相
对性软弱，对神的救赎计划失去信
心。⁴⁵

信徒和教会必须深信，在上帝绝对的主权
下，祂一直引导著教会走在祂的救赎历史
计划中，教会、门徒的任务就是要传福
音，让更多未认识耶稣的人听闻福音，并
在耶稣基督里，生命不断更新；不单让教

会基督化，也要让整个社会文化基督化。

（四）文化基督化

1. 异象的促成

文化基督化的异象，与中国福音化的
异象不能分开；按赵天恩的阐述，中国福
音化的异象，让他积极参与在内地的福音
工作，亦在1978年创立了“中国教会研
究中心”，作为研究中国及内地教会的基
地。随后为了更进一步培育福音工人到
内地作福音工作，1984年决定成立中国
宣道神学院，1985年成立门徒训练课程，
1987年中国宣道神学院在香港正式成立，
同时赵氏又协助台湾道生神学院复校，期
盼借著神学教育培育更多神国工人，到内
地展开福音工作。在实践这些行动时，
赵氏深感福音工作不应只限于个人与上帝
的关系，也要落实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由
此亦产生了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⁴⁶

赵天恩的博士论文研究，集中讨论
二年代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以
及当时教会的回应。他指出那时候非基运
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存留至今，甚至
仍然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不应与社会教育连
上关系。赵氏明言，这对基督教造成的捆

45.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9。

46. 见〈三化异象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4。

绑，甚至比外在逼迫更甚。⁴⁷反之，他认为基督信仰，应该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提供基督教独特的贡献。事实上，不论在二、三十年代，还是到了今天，福音信仰与文化关系，仍然是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赵氏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多次与学生讨论到信仰与中国文化的课题，可见这亦是学生、信徒所关心的议题；尤其是一群台湾年轻信徒、知识份子，特别关心该如何将信仰与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这亦掀起赵氏对台湾产生负担。⁴⁸1986年春季，赵氏在台湾成立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86-87年间亦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当时赵氏看见：“香港宜作大陆福音工作，台湾宜发展文化基督化的事工。相信将来台湾基督徒对大陆的贡献，也可能是在文化重建及神学教育方面。”⁴⁹

文化基督化的发展，显然与赵氏从事福音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关。在推动神

学教育的过程中，赵氏常常思考“如何在中国思想（包括马列主义思想）的大环境之内，发展合乎圣经的神学？如何在中国教会跟社会环境中建立有效的神学教育？”⁵⁰在思考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不能只从神学角度出发看事物，还需要从“人间平面角度”来看世界，于是1968年他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方研究系修读博士课程，⁵¹翌年在费城建立“基督教研究中心”，推动思想圣经化，编辑《神学生》与《文化基督化》。⁵²在学期间，他修读了不少中国哲学、文化、文学的科目，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1970年他曾出版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文章，⁵³随后亦从历史角度（包括中国历史及中国宣教史）出发，分析和研究福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⁵⁴这些研究成为“三化异象”的重要基础，其中文化基督化的异象和使命，就是要中国信徒带著基督教思

47.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9。

48. 赵天恩：〈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十周年感言〉，《扶我前行》，101。

49.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8。

50.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3。

51.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3。

52. 王嗣岳编：〈赵天恩生平年谱 1938-2004〉，83。

53. 见赵天恩：〈中国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本质〉，《超人的苏醒》（1970年12月），95-122；转载于《扶我前行》，142-160。

54. 见赵天恩：〈从中国历史看福音与文化关系〉，《校园杂志》（1986年4月），4-9；赵天恩：〈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今日华人教会》109（1987年11月），11-13；转载于《扶我前行》，165-184；另有〈中国文化的未来与福音的关系〉及〈从中国宣教史反省福音与文化的关系〉，见赵天恩：《扶我前行》，185-204。

想投入文化界，赵氏自言这是福音工作的一部分；⁵⁵ 要用“基督教思想影响中国的文化，道化中国，成全中国文化，然后在文化界争取领导权，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主流。”⁵⁶ 特别在当代中国文化虚空的状态下，基督徒更要为中国未来带来盼望，改造中国文化。⁵⁷

2. 异象的实践

中国福音化的实践，在于培育及差派神国工人，到内地进行布道工作；教会国度化的实践，则在于教会的事工发展，培育具有国度意识的牧者，让教会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而文化基督化的实践，部分在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自1978年赵天恩在中国神学研究院建立“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后，他一直致力对中国大陆作出各项研究。研究中心成立的头三年，主要放在对中国大陆政治、文化、宗教的变化作出报导，但并未作深入的分析。后来他为研究中心定下三个主要研究方向：（1）分析中国大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的动态；（2）报导大陆教会（公开聚会及家庭聚会）的发展型态；（3）基督教在华史的初步研究和资料整

理。⁵⁸ 他期望由华人从事中国教会及社会的研究，可以有助中国教会的整体发展，而并非从外国人的角度出发，或以外国教会的利益为依归。⁵⁹

赵天恩提出以华人角度去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他的态度并非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出于宣道的目的，由始至终他都心系神州，以向中国人传福音为最重要的事！借著研究，他希望可以让更多未闻福音的中国同胞可以认识耶稣，更期盼那些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信徒生命不断成长，结合信仰与文化。故此，对赵氏而言，研究与宣道是不可分离的。这项研究的坚持，亦让赵氏付出相当的代价。1980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神创立了两年，他却与香港中国神学院的一些同工在研究中心的路向上出现分歧，有些同工认为研究中心乃为支援神学院教学而设，故不赞成赵氏继续参与内地的福音工作，但赵氏却认为神学教育应以教会宣道而设，宣道和研究之间并没有冲突。因此，他为了坚持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异象，决定将研究中心在中神的祝福中独立出来，成为一所结合研究和宣道的独立机构。⁶⁰ 此外，研究中心大胆地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大陆

55. 赵天恩：〈福音与中国文化的更新〉，《扶我前行》，184。

56. 赵天恩：〈中国文化的未来与福音的关系〉，《扶我前行》，191。

57. 赵天恩：〈从中国宣教史反省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扶我前行》，199、203。

58. 赵天恩：〈以感恩为祭献与神〉，《扶我前行》，41。

59. 赵天恩：〈以感恩为祭献与神〉，《扶我前行》，42。

60.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5。

的宗教政策，此举亦令研究中心成为众矢之的，赵氏甚至被中国两会领导公开指摘。⁶¹ 于赵氏而言，他只希望以客观态度去了解和分析内地教会的情况，以及政治运动变化带给国内教会的影响，并据此拟定中国宣教的策略。这可说是出于他对文化基督化的坚持。

除了进行中国社会文化及中国教会研究外，文化基督化的实践，亦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基督徒，透过社会参与，在社会不同层面实践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念。一方面，这些基督徒专业人士，能够透过其专业知识，为中国社会带来贡献；另一方面，这些专业人士若能研究神学，以圣经原则解释他们的专业知识，亦能带来信仰和文化的融合。中国神学研究院初成立时，以大学毕业生为学生对象，并且强调提高圣经和神学研究的水准，好让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结合；⁶² 显然赵氏期盼可以透过神学教育，培训一群华人的专业人士，去承担文化基督化的使命。后来，赵氏承担基督书院院长一职，亦是为了让

学院成为实践三化异象的基地，培育基督徒专业人才从事文化基督化的伟大事业。⁶³

3. 异象的涵义

文化基督化其中一个重要涵义，在于确定文化更新的必须性。深被改革宗思想影响的赵天恩，确定信徒在世上负有文化使命；上帝按著自己形象造人时，便立下人类管理世界的任务；然而犯罪堕落的人，却不再以荣耀上帝来履行文化使命，而只是为了一己的益处。故此，文化需要更新；人首先要在基督里得著生命的更新，然后走在成圣的路上，让圣灵每天转化他的思想和行为，转化他的生命。这种转化不单影响个人，亦可慢慢改变家庭、教会，甚至整个社会。若要成功地让文化得到更新，就必须要先明白当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及对人民生活有著重要影响的民间思想，同时亦需要让现代人明白自己处身的环境，让他们借著福音，对个人生命、社会和历史也有所认识。⁶⁴

若要成功地实践文化基督化，来自

61. 1987年8月三自、基协常委会议在成都召开。负责外事的基协副会长韩文藻先生在会上发言，指责赵天恩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随后这讲话发表《天风》杂志，并加上评论员文章，言词激烈，攻击性强，实属罕有；赵氏认为这是故意制造其“反共”形象；惟他重申，自己任何政权、政治无关，作为中国基督徒，只以传福音来表达他爱国的方式。参 伦若愚：〈与赵天恩牧师谈《天风》对他的指责〉，《中国与教会》64（1988年3-4月），5-7。

62.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扶我前行》，12。

63. 赵天恩：〈走过感恩岁月〉，《扶我前行》，59；赵天恩：〈基督书院与福音异象〉，《基督书院院讯》51（1989年11月），见《扶我前行》，114。

64. 赵天恩：〈从中国宣教史反省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扶我前行》，201-203。

不同阶层的信徒皆有著重要的角色。拥有专业训练的信徒，可以在文化界、教育界、医疗界、社福界等不同层面上，践行信仰，同时运用他们处身的位置，发挥信仰的影响力。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升斗市民，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彰显著基督信仰价值时，文化也会点点滴滴地被更新和转化。每一个在世生活的信徒，也能天天“道成肉身”地活在社会中；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都是传福音的流通管子，他们生命的素质，都是实现文化基督化的关键；正如赵氏所言：“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有像基督的生命，以信、望、爱为生命的总纲，更要发展合乎圣经的人格，灵巧、谦虚、有正确的判断力，有慈悲的心。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兼备西方的真、善、美和东方的智、仁、勇这六项优点。所以，福音传人应该靠主的恩典，发挥他属灵能力的权柄。作为一个时代的福音传人，必须有尊主为大的敬虔生活，广泛的世界观，对历史的责任感，对民族的认同，才能参与在塑造自己民族的未来行列之中。”⁶⁵

（五）三化异象的整体实践

在赵天恩的一生中，异象、呼召和行动是他的属灵循环规则，上帝首先让他有属灵的看见，并成为他心中的呼召，然后他就积极地以行动来回应；在实践行动中，上帝又让他有更清晰的异象，以及更具体的呼召，这样他对异象和呼召也更加委身。⁶⁶ 所以，透过不断的实践行动，他的三化异象亦越见清晰。

赵天恩在 1985 年提出“三化异象”后，就一直寻求不同的方式和行动，去实践“三化异象”；而 1988 年担任基督学院院长一职，可说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当时赵氏有机会与人谈到基督书院的需要，当被问到该如何发展基督书院的前途，才最有利于基督的国度事工时，赵氏随即回答：“当然是训练福音使者，使中国福音化；训练教牧人才，使教会国度化；并训练基督徒专业人才，使他们参与文化基督化的伟大事业。”经过多番商议后，除了继续开办大学部，作为文化基督化的基础外，赵氏亦锐意在基督书院开办基督教中国研究中心及神学研究院，⁶⁷ 以回应中国福音化和教会国度化的异象。从几篇基督

65. 赵天恩：〈从中国宣教史反省福音与文化的关系〉，《扶我前行》，204。

66.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事奉基础〉，《扶我前行》，23。

67. 赵天恩：〈基督书院的发展方向〉，《基督书院院讯》53 (1990 年 2 月)，转载于《扶我前行》，118。

书院的院讯可见，⁶⁸ 赵氏担任院长时，一直秉持著基督教神学理念办学，按著上帝在创造人类时给予人类的文化使命，朝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神学三方面发展；同时他亦期盼以基督教通识教育哲学来栽培学生，按著基督教价值观对学生进行品格塑造。对于已信主的学生，更提供灵命课程，激励他们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此外，更计划向学生灌输传福音和宣教的异象，鼓励学生毕业后投入在差传事工；期望可以借此促进“三化异象”的实践。可惜的是，后来赵氏和基督书院董事会在工作安排和建立神学研究院的事上未能达

成共识。与此同时，赵氏亦看到中国内地福音禾场的迫切需要；因此，同样是为了“三化异象”的实践，在1992年7月赵天恩正式辞去基督书院院长一职。⁶⁹ 虽然最终无法透过基督书院来实践“三化异象”，但从赵氏对基督书院作出的十年计划蓝图内，我们的确看到了“三化异象”的整体实践。

赵天恩随后将事工集中在中国福音会里推进。1993年他在台北中国福音会的早祷会上，重新回顾和整理“三化异象”；并且提出：异象的实践在于研究、培训和差派，这亦成为中国福音会的事奉方向。



赵氏的“三化异象”实践，先由“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开始，并展开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研究工作；其后因为看到国内教会的需要，开展了教会工人的培训事工，最后福音会亦因直接参与内地事工，而成为一所差派宣教士的差会。⁷⁰ 在继续进行中国社会和教会研究的同时，福音会亦开展多元的培

68. 院讯文章包括〈基督书院与福音异象〉，《基督书院院讯》51(1989年11月)；〈基督书院的发展方向〉，《基督书院院讯》53(1990年2月)；〈全人教育——基督教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督书院院讯》55(1990年5月)；〈追求永存之爱 结出仁义之果〉，65(1992年5月)，转载于《扶我前行》，112-130。

69. 赵天恩：〈事奉的再出发〉，转载于《扶我前行》，133-134。

70.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事奉基础〉，《扶我前行》，27。

训事工，包括通过环球广播公司进行的“空中神学”，向内地同工展开有系统的三级培训课程；门徒训练中心、中国宣道神学院和道生神学院等。培训的目的在于训练信徒去内地传福音，所有圣经培训、神学装备，甚至灵命操练，都是为了让信徒们在传扬福音时有稳固的基础。故此，“三化异象”的整体实践如下：研究，是为了有良好的培训；培训，是为了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差遣、实践行动则是让人对福音禾场有更多的了解。传福音时遇到的问题，可以成为研究的丰富素材，研究成果又可运用在禾场上解决问题。这样，研究、培训和差遣三者互动，成为了“三化异象”的重要实践。⁷¹ 其实早在1990年，赵天恩正筹划基督书院的十年计划时，研究、培训和差遣的观念早已存在；当他对外分享“三化异象”如何成为基督书院的办学宗旨时，提到“三化异象”的性质：“（异象）以向中国人传福音为目标（Evangelizing the Chinese People as our

goal），以培训为方式（Training workers as the means），以研究及计划为支助（Research and planning as aids）。”有关异象的达成，他亦有此总结：“异象是借著祷告、委身、研究、计划、传递、殷勤工作及团队事奉而达成的。（The vision i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prayer, commitment, research, planning, communication, hard labor, and team work.）”⁷²

故此，对赵天恩来说，“三化异象”的实践就是透过研究、培训和差遣，三者互动而达成的，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异象的委身，以及团队的配合，这样异象才能实现。



71.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事奉基础〉，《扶我前行》，29。

72. 赵天恩：〈三化异象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Vision Outline〉，50-8。

亟待更新的情感与友谊

访谈温哥华维真神学院的创校院长侯士庭博士¹

采访：何任

1. 侯士庭博士于1922年11月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1950年，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该校担任地理学讲师。1970年，他与妻子和四个孩子移民到加拿大，成为温哥华维真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担任第一任校长、灵修神学教授。他还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鲁益师研究所(C. S. Lewis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编辑、基督教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尊敬，是教育和平信徒装备的领袖。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基督教经典、历史神学和基督教灵修传统。侯士庭出版了许多书籍和文章，译成中文的书籍包括：《灵修神学发展史》(中福，1995)、《转化生命的友谊》(上海三联书店，2015)、《美好品格的塑造》(上海三联书店，2015)、《幸福真谛》(上海三联书店，2015)、《心灵渴望》(上海三联书店，2016)、《喜乐流放者》(上海三联书店，2019)、《师徒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20)。

编者注：

在《福音！文化！国度！》的创刊号上，我们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侯士庭博士的最新采访。¹ 侯士庭博士是温哥华维真神学院的创校院长，也是基督教灵修神学的领先人物。他是中国福音会(CMI)已故创办人赵天恩博士的老朋友和神国服事伙伴，他们的伙伴关系始于1990年代。当时赵天恩博士特别邀请侯士庭博士来香港和台湾开办一系列基督教灵修神学史的讲座，将灵修神学介绍给两地的教会和神学院；后来福音会又通过出版发行侯士庭博士的书籍，例如《转化生命的友谊》，



将基督教灵修神学及灵命塑造的理念带进了中国大陆的教会。侯士庭博士通过他的讲座和著作，不仅让很多华人基督徒首次接触到大公教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灵修传统，更对中国的神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神学院开始意识到神学教育中灵命塑造的重要性。

因著侯士庭博士与中国福音会的这份特别渊源，我们有幸在数月前采访了他。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亲自前往温哥华拜访他，但侯士庭博士还是非常慷慨地先通过电邮、然后通过网上视频一一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令人惊叹的是，即便 101 岁的高龄，侯士庭博士依然思维敏锐，声音宏亮，回应每个问题时，用词精准简洁，没有任何拖延。事实上，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具前瞻性的历史学家分享著教会发展方向上的真知灼见，更是作为属灵的父亲，向我们这些后辈展示出一个活在与耶稣和他人的活泼友谊中的生命是何等迷人、美丽。的确，侯士庭博士活出了他一生竭力传讲的信息——建立与耶稣基督的友谊！为此，我们深深为他而感谢天父上帝。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侯士庭博士的女儿克莱尔·泰勒女士，没有她在沟通过程中的竭力协助，实在不可能有下面的采访。

何：侯士庭博士，您曾多次访问香港和台湾，也在维真教过很多华人学生。您对华人、华人文化和亚洲的华人教会有何

印象呢？

侯士庭博士：作为外国人，我们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深感敬畏。然而，就文化而言，华人的情感表达能力相对来说不如西方人。很多华人可能很友善，但他们却往往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至于表现出来的是城府很深，叫人难以琢磨。我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有关。几千年来，各种各样的战争和起义从没有间断过，且几乎是周期性地发生著，而这在上个世纪尤其加剧。持续不断的战乱和变革，不仅使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恐惧中，更是迫使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由于从没有过让自己表达所有情感的机会，这就不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在情绪上容易两极化，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惊恐万分，就是爱得死去活来。

感谢神！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了释放的信仰群体。基督让你得自由，你就真的得了自由。因此，中国基督徒可以自由地表达情感，包括脆弱的情绪，也能够接受他人的脆弱。这种在中国文化中祖祖辈辈所缺乏的自由和安全感，如今都可以也应当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体验到。

何：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深刻。没错，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所有的情感。不过，现实中许多中国基督徒对自己内在的感情世界是陌生的，更不用说

表达出来了。您觉得这个困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侯士庭博士：其实，在这点上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基督徒并没什么不同。情绪的封闭在当今基督徒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这跟整体的文化有关。今天，人们见面时，通常的问候都是：“你好吗？”、“我很好！”，根本没有表达我们当下真实的情感。在这种“语言的旷野”中所培育出来的基督徒，难怪在神面前的敬拜也是冷冰冰的。更糟糕的是，今天我们可能身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文化处境中——一个对历史丝毫不感兴趣的后现代文明。一旦失去对历史的理解力和欣赏力，人类的记忆就浅薄得像一个碟子，而不是一个满溢而出的杯子。其结果就是，我们怠惰的大脑导致我们对内置于历史事件中的逻辑关联性视而不见。这便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看不到生命的希望而陷入抑郁的原因。

此外，我还认为，基督徒情绪上的贫瘠也可能源于我们对感情起源的误解。其实，所有真情实感都源于清教徒所说的“神之爱的泉源”。正如太阳是光源一样，神的爱也是我们人类所有情感的源头。这份神圣之爱便是基督徒经历的核心焦点。我们生于爱中，因爱而活，正如赞美诗《主爱超越》（“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Charles Wesley 作词，William H. Draper 作曲，1747）所唱——“神圣主

爱，超乎万爱，天上欢乐降人间”。一旦神的爱成为我们内心主要的情感，它自然会带出喜乐与平安。因此，如果说十六世纪教会需要宗教改革来更新大家的思想，今天的基督徒则需要更进一步在情感上的改革，即从内心体会神的爱，从而带来情感上的更新，尤其是由心而发的感激之情。若没有感恩，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

何：感谢您的深入分析。那对您而言，是什么削弱了当代基督徒文化上的抗衡力，以至于他们和非基督徒一起陷于语言的荒野、对历史的漠不关心中而难以自拔？

侯士庭博士：基督教发展史和世界文明发展史是拧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己智能的痴迷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自以为有了聪明的头脑，就足以对一切了如指掌。一旦基督徒也以这种纯理性的方法来认识神，神学就变成了抽象的认知，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毫不相关。然而，这完全不是使徒们所理解的神学。对使徒保罗和雅各来说，“神学”是一种伦理行为。具体而言，是身为神的先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传道和敬拜。这是非常实用的，一点也不抽象。可悲的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神学”已经彻底沦为“纯粹的理论”，我们的信仰由此也误入歧途。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不仅对神的认识停留在理性上，甚至还以理

性来主导敬拜，唱赞美诗便演变成了例行公事的表演。那根本就不是敬拜！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亟需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我们必须尽早恢复“神学”的真正涵义。

何：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有些人信主多年，但只在理性上认识神的爱。一段时间后，他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软弱。但令我惊叹的是，您自己不仅是一位“专业学者”，更是深受维真神学院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属灵导师。您能分享一下您是如何成功地避免堕入“理性主义”的呢？

侯士庭博士：对我而言，关键在于不要只关注学术，而是在做学问和建立友谊之间找到平衡。神永远是我们生命的重心。一旦我们将祂置于生命的首要地位，祂自然会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里面生发对人的怜悯同情之心。我们人是语言的承载体，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就是由各种名词和动词组合而成。通常来说，名词是抽象的概念，但动词是具体的行为。同样，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静止的或抽象的，而是活泼生动的（如在圣诞节，我们庆祝自己的重生；而复活节则意味著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展开新的生命之旅）。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以积极地活出与耶稣的友谊为标记，首先将眼目定睛在祂身上，然后，从祂那里领受对他人的爱和怜悯之心。

我留意到牧师们通常不会表达情感，但“牧师”一词在拉丁语中却是“父亲”的意思，这意味著牧师是众人的属灵父亲。显然，作为一个父亲，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是很重要的。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我朋友在西藏向僧人传福音的照片。那群年轻僧侣中的大多数人年幼时就离家，在寺院里长大。他们从未享受过被父母疼爱的滋味，就像孤儿一样，也不懂得善待自己。这时，我的朋友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以父亲般的慈爱爱著他们每一位，日复一日。他们开始接受他的爱，还想更多认识他，明白他如何可以这样爱他们。后来，这八位西藏僧侣都接受了耶稣的爱，成为祂的朋友。之后，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关顾他人。这张照片不仅提醒我对他人要有怜悯之心，更要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如父亲般陪伴他们经历水火。即使对于非基督徒，我们也要去体恤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并以同理心来体会他们挣扎中的不易。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而我们基督信仰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只有愚顽人才会心里说，“没有神！”（诗十四1）。一旦我们将彼此视为神的形象，由祂创造，我们自然会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目的，其实就是善待每一个人。简而言之，我们一生的主要功课就是建立与耶稣基督的友谊。透过这份亲密关系，祂会让我们的属灵生活越来越丰盛、满溢。

何：建立与耶稣的友谊、复苏我们的情感实在重要。结合您自己的切身体验，您认为基督徒可以从哪些方面著手，培养和加深我们对神的爱呢？

侯士庭博士：对于基督徒来说，爱不仅重要，而且至关重要。因此，要与耶稣建立友谊，首先要体验到神的爱。就好像 17 世纪的欧洲，一个瘟疫频发的时代——仅在 1640 年代，瘟疫就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神的爱爱的时期，却发生了西方历史中对神的情感最激烈的一次更新，产生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敬拜。每个幸存者对神充满了无比的感激之情——“啊！感谢神，我还活著！”你看，我们对神的爱，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来于对神的爱的亲身体会。

不过，他人对神的炙热之爱，也可能感染我们，带给我们情感的更新。如都铎王朝时期教会曾产生过伟大、富有激情的敬拜，而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就是其中点燃众人对神的情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坦诚：“我不是在向你们讲道，而是在你们吟诵一首足以激起你热情敬拜主的诗歌。”这种感染人心的爱神之情，我们也可以从清教徒的祈祷中感受到。《穿透天堂》（*Piercing Heaven*, 2019），是罗伯特·埃尔默（Robert Elmer）编辑的一本清教徒的祈祷文集，从中你可能会感受到对神最动人心扉的情感表达，而你对神的爱火也会因此而翻腾

上升。

然而，圣灵的工作并不受书本的限制；书本只是一种帮助。神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和管道来激发我们对祂的爱。例如，东正教从未试图揣摩和明了神或祂的作为，而是接受祂就是一个奥秘的存在。东正教徒对神的情感表达是透过圣像体现的。

他们的圣像就像圣画一样，传达了整个福音信息，既承认神奥秘之本质，又展现祂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的圆满彰显，因此，圣像是一个很不错的默想神的工具。我向不少朋友推荐了一些圣像，他们开始在家里放置它们，作为灵修的辅助。（侯士庭博士随即展示了一个献以撒的圣像）

侯士庭博士：这个圣像让我想起了丹麦伟大哲学家祈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对《创世记》二十二章中所记载的这段故事的默想。在祈克果的默想中，神在亚伯拉罕的梦中显现，指示他：“献上你的儿子为祭吧！”显然，这个要求让亚伯拉罕震惊不已：“什么？主啊，我不是已经为他行了割礼、献给你了吗？这还不够？你要把他完全夺走吗？”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神根本没有夺走以撒。但当亚伯拉罕凭信心顺服时，他就不再是同一个人，而是被更新转化了。献以撒的事件证实了神的确是一位充满爱的神，祂向我们所行的是爱，

而不是叫我们绝望的可怕作为。也许我们基督徒需要培育一种新的情感，即审美意义上的情感。这是我们在巴黎，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观赏清教徒们竭力追求信仰自由时、创作的那些伟大艺术品时会产生情感。其实，敬拜神本质上就是对圣洁之美的回应，正如赞美诗《以圣洁之美敬拜主》（“Worship the Lord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J. S. B. Monsell 作词，Henry W. Baker 作曲，1863）所表达的。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之外，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像马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凝视祂、尊崇祂，直到整个人都被祂的爱所充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更多默想的操练，而非频繁的说教和空洞的解经。我们可以效法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1834-1892），一次只默想圣经中的一句经文，就像欣赏一颗宝石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发现它的美丽和丰富。这种默想式的敬拜可以引导我们深入圣经的精意当中。

像所有其他基督徒一样，我自己特别喜欢默想《诗篇》。这本旧约百姓的祈祷书，将人类的全部情感——恐惧、愤怒、爱、喜乐和平安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强烈的情感表达，莫过于《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诗二1；和合本）这是一个列国躁动不安的场景，其历史背景是大卫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以色列王国，却夹在亚述帝国和埃及帝国之间，成了一个

拉锯战区。面对这种不稳定的处境，大卫不仅透过《诗篇》第二篇表达了他自己，也是整个国家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如果不了解诗篇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它们的情感深度。正是这种历史和情感的理解，使《诗篇》比许多当代所讲的道或所唱的诗歌更能带领人敬拜神。尤其唱赞美诗时，我们常常过于专注在唱的上面，而未能完全吸收歌词。因此，我建议大家在一周内花时间默想主日唱的赞美诗。当我们在独处中阅读诗篇和赞美诗，我们就不再因歌唱而分心，而是可以默想歌词，从中品味到诗歌创作者们情感的精髓，我们心中的喜乐和敬拜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例如，当我默想《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诗二三4上；和合本）这节经文时，就不由联想起使徒保罗的话：“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十五55；和合本）到默想结束时，我会更进一步说：“死亡其实是引导我进入永恒崇拜中、实现我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好朋友。”因为当我们去世时，神将会以平安与慈爱迎接我们进入祂的殿中，全心充满喜乐地敬拜祂，直到永远。

何：感谢您为我们提供了所有这些具体的指导，帮助我们加深对神的爱。除了这些个人的属灵操练之外，教会作为信仰群体可以怎样帮助大家更新情感呢？

侯士庭博士：在教会内营造一种家庭的氛围，让个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治理的需要，教会免不了要建立体制，但久而久之，体制会滋生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这使得教会缺乏人情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神和彼此面前“做自己”的自由。切记耶稣称我们为朋友，我们与祂的关系以及我们彼此的关系应该体现出友谊的本质。这让我想起那首美丽的赞美诗《耶稣恩友》（Joseph M. Scriven 作词，Charles Crozat Converse 作曲，1855）：“耶稣是我亲密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

这些年，一场新的“让教会成为教会”（Being Church）的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愿景是将教会从僵硬的体制架构中释放出来，成为幸福自由的“家庭”。所谓“让教会成为教会”，强调活出敬拜而不是将敬拜当作表演，就如真正的先知或传道人，就是那些活出他们所宣讲信息的人。神不仅是应许救恩，更是透过祂的儿子成就了祂的这个应许。耶稣将这份神圣之爱活了出来，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宣扬它。因此，教会非常需要复兴，整个信仰群体要在生活中落实这份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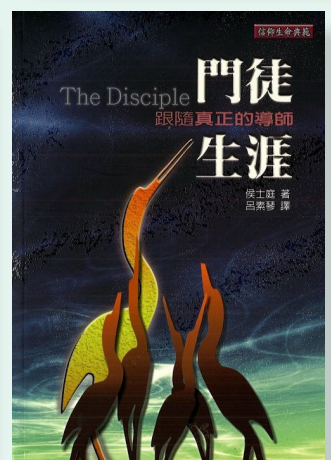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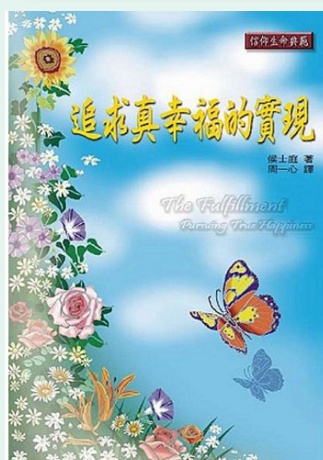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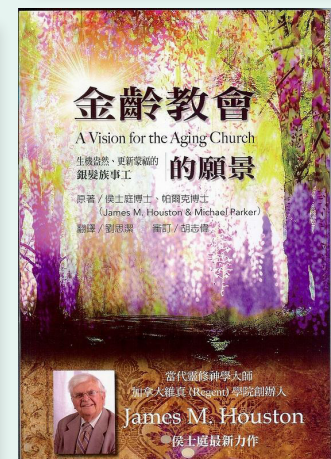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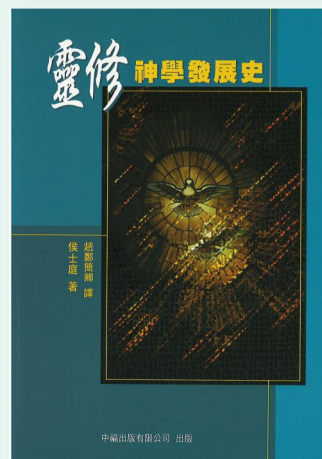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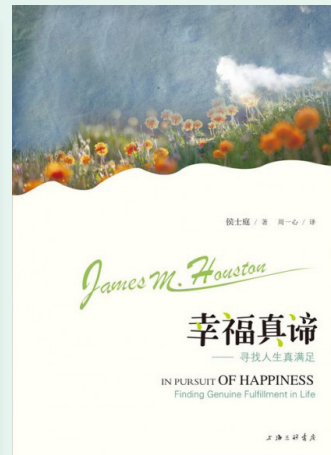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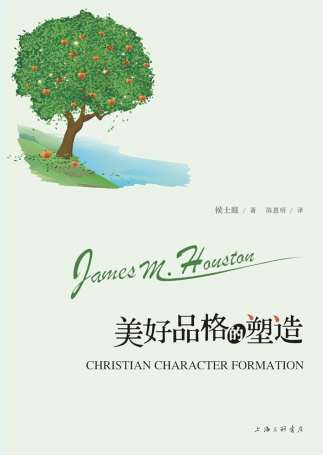
何：感谢您介绍“让教会成为教会 (Being Church)” 的运动，和“做教会 (Doing Church)” 不同。“让教会成为教会” 强调信徒与神、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而“做教会” 的焦点则放在活动和事工上面，可

能会忽略了这种关系。可是，要从多年以活动为导向的习惯，转化为以关系为导向，并非易事，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思考和消化。最后，您就目前遭受严厉打压的中国教会有什么鼓励的话吗？

侯士庭博士：他们当下所受的打压，其实很可能使他们得以经历自由。即便处境看似日益恶化，但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而圣灵也给我们能力活出这份自由。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鼓励自己每天为基督而活。作为基督徒，无论是否传道人，我们都需要重新发现主的喜乐确实是我们的力量。这种喜乐并不取决于环境，而是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因此，对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所有人专注于培养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让祂的爱全方位地更新你的生活和服事。我们基督信仰的最终目标不是拥有完美无瑕的神学、或一丝不苟地履行宗教职责，而是与耶稣成为亲密之友，并通过活出祂的爱而让众人都认识祂。

侯士庭教授的書籍



一位江苏的忠仆

雅婴¹

前言

杨集镇是中国大陆一处农村小镇，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内。二十世纪初，美南长老会便差派宣教士在灌云县周边服侍，闻声牧师（Rev John W. Vinson）则于 1910 年在这小镇上建起了教堂。之后四十年间，神在这片土地上兴起了不少本土传道人，像任宇治、郭光恩、李振怀、李奎、单昭凯、张连甲、毕德茂、葛振亭等等。这些名字于我们而言，仅仅是一些陌生的符号，而对神和祂的教会却不同。他们是神的仆人，曾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上经历新生，并且将赐生命的主传扬开来。神总是使用祂的仆人，一代过去一代

又来，福音的种子不但存留下来，而且发旺兴盛。如主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 24；和合本）

李为华（下文称李先生）是杨集镇的一位传道人，1940 年出生，1960 年蒙召奉献，1965 年受逼迫被判劳改，1978 年被释放返乡。1978-1979 年他上访平反，之后便以清白身份开始传道。1985 年他所带领的杨集教会会众超过一千，便购地



1. 作者为大陆某城市家庭教会 80 后牧师，道学硕士，在读教牧学博士生。2010 年全职至今。



预备建堂，直到 1988 年才开工。2006 年杨集教会信徒已近四千人，他却因遭构陷而退出灌云县三自系统，随即开始家庭教会。2022 年他受感著述了《灌云县教会历史》，2024 年 3 月安息主怀。

笔者自 2008 年结识李先生，向他请教学习，并参加他所带领的家庭教会，也阅读了他留下的资料，得以更多认识他，不由得对他心生敬仰。他作为长辈，经常鼓励我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每次接待我如同一位江苏的忠仆接待主，令我备受鼓舞。正是前辈默默地为主所用，让主的光照耀不知名的小地方。仅以此文纪念李先生这样忠心侍奉主的仆人，也勉励自己与同辈能甘心奉献，砥砺前行。

苦难之处有恩典

李先生的一生充满艰难，从人看来



实在没有可羡慕。然而，他过世的时候，却被许多人追念，连外邦人都称赞他的一生有价值。苦难可能摧毁人，并不值得歌颂，但苦难也可能显示出神如何将苦水变甘甜，引人出埃及，进入迦南。

受欺压信福音

李先生虽然小时候随母亲参加礼拜，但当时他并不真正明白信仰，更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十三岁考入伊山中学，在浸染于无神论教育之后，更是偏离了基督信仰。之后他考入杨集高中，在当时算是高材生，前途无量。然而，镇长与商人

合意要强占他家房子，故意免除他父亲的工作，以致全家生活极其艰难，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小学任教，以补贴家用。1960年秋，他仍被冠以“信耶稣是美国系统”、“房子不租给政府开饭店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罪名，被开除学籍和工作。他眼看前途一片黑暗，绝望之下甚至想绝食寻死。

然而“神借著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伯三六15；和合本）当时他正处于人生谷底，有一位传道人带领肢体前去探望他，并向他传福音。他在绝食第三天，心中正思考时，似有一道强光充满了他的内心，且伴有金光闪闪的一行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他瞬间心境豁然大开、如释重负，开始喜乐地唱诗赞美神。

被监禁得保全

他遇见主之后，便火热追求认识神。然而，外在的环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一方面，他因为家中房屋的问题，与父亲一起遭到毒打；另一方面，统战部明令教会不可接受他参与教会活动。他只能暗中接受传道人的帮助，在家中研读圣经和神学书籍。当时的政府常组织人搞政治运动，尤其是针对异己进行批斗。在大会上接受审问，多是无端无礼的身心折磨，那时候的基督徒多要经历这种试炼，李先生也不例外。他最终被县法院判刑，1966

年被关押在江苏省洪泽湖劳改农场。

1978年，他被释放返乡后，受到弟兄姐妹的热烈欢迎。他也感恩主多年暗中的保守：在监狱里虽失去自由，但也免了死亡；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因政治压迫身心受极大摧残，甚至自寻短见。李先生得到自由后并未马上开始服事，因他感到政府应当还他清白，几经转折终于申诉成功，弟兄姐妹都为之高兴不已。他40岁才开始公开传道，服事百废待兴的教会。

经风暴离三自

李先生对教会牧养治理毫无经验，幸亏他的恩师程诗述健在，他们便一同筹建了灌云县的两会，索要被没收的教产，恢复公开崇拜，供应圣经和赞美诗，培训诗班和同工等等。杨集教会从他家开始的几十人逐渐增多，买下的南小街教堂，很快超过六百人聚会，1985年又另外买下一块1884.2平方米的地。尽管信徒们只能露天聚会，但都喜乐感恩。两年后人数已经超过两千，并于1988年复活节后开始建堂。教会日益兴旺，信众越来越多，在当地影响很大。

教会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传道人仿如旧约的先知，需要面对国家的政策与执行政策的各级组织种种刁难。宗教局官员更是为了一己之私，借著基督教两会干预教会内部事务，尤其是人事和金钱方面。程牧师和李先生与他们的冲突不

断，先后都被解除了两会的职务。李先生在 2006 年被迫辞去杨集教堂的事奉，开始家庭教会。尽管宗教局干部与两会主任后来因贪污被判刑，但教会的复兴与团结已一去不返。

李先生当然不舍得离开自己辛苦操劳建立起来的教会群体，让二十多年的服事成果付之东流。他为建教堂筹款付出过不少心血，也以教会为家，视年轻肢体如自己的孩子一般。神为什么容让恶人阴谋得逞，许可他们破坏教会？后来，他才领悟：他在三自无法按照神的旨意牧养教会，被排挤和迫害是无可避免的，倒不如出来更专心于传讲圣经、牧养群羊，培养爱主的下一代。

跟随主学牧养

李先生并未受过很完整的神学训练，对教会以及三自的认识有限，但神透过艰难的环境一步一步引领教导他。他在家庭教会的牧养是非常扎实的，每周都带查经、祷告会和主日崇拜，平日也研经祈祷，答复来访者疑虑。不知不觉中，他牧养家庭教会的十余年间已经写下 35 本讲道集，编写不少诗歌以及地方圣剧。农村教会喜欢他清晰的讲解圣经，我春节期间曾参加他们的崇拜，目睹将近千人专心致志听他讲道，众人同心祷告的声音如雷震耳，场景令人动容。我听过他多次讲重生得救的道，极力呼吁弟兄姐妹真心悔改信





“要听神的？还是听人的？”或许是他的性格和受苦的经历塑造了他，但也可能这正是他一生的信息，是他得胜的秘诀。

李先生受过多次类似的拷问：你愿不愿意放弃信仰？而每次他的选择都引领他更与主亲近。25岁的他被批斗后，法院法

官承诺，只要他放弃信仰，不但可以无罪获释，而且能恢复教师工作，甚至可以培养他加入组织，成为干部。但他选择信仰，因而被判刑。

官承诺，只要他放弃信仰，不但可以无罪获释，而且能恢复教师工作，甚至可以培养他加入组织，成为干部。但他选择信仰，因而被判刑。

靠主，也教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遵行神的旨意。我与他们中的肢体交通，感到他们与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其中忠心有见识的同工不少。

他在38岁刑满释放后，立即到县法院申诉。副院长只提出一个条件：只要他保证不信教，马上就给他平反并恢复工作。于是他选择绕过县法院，三次去北京信访办，后来终于被中级人民法院平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但县级法院面对上级法院的判决书，仍坚持原先的态度：既不为基督徒平反，也不允许基督徒作老师，免得“毒害”祖国的下一代。李先生的态度也始终不变：宗教是自由的，绝不放弃信仰。他在经过试炼后，就开始了传道生涯。

得胜环境的秘诀

李先生不像那种平易近人的老人，倒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他说话总是刚强有力，而且直接了当，未免有时会显得不“善解人意”。他的口头禅是，

他的教会兴旺之后，宗教局长黄庚仁多次多方想从教会捞好处，都被李先生阻挡下来。黄局长说得很直白，“只要你听

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以你的资质早该按立为牧师了。”李先生说，“牧师是教会的圣职，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更何况按立牧师若必须先损害教会的话，我就不做牧师。”李先生一辈子没有牧师或长老的头衔，但他被大家尊称为“先生”。

李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尊主为大。他常常为人求问主，得到回应后会很清楚地告诉人如何选择神的心意，比如：考大学的志愿该选择什么学校、神在南方为她预备了对象、你把婆婆接到你家来照顾、老人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他相信为信徒求问主，是牧养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应该学习如何运用圣经去判断，在具体做选择时必须去求问神，为人指点迷津。我很好奇他如何求问主，并问过他相关的经验。他强调，在不违背圣经原则的情况下，求问者（包括寻求帮助的肢体和代祷者）的心很重要。李先生会要求肢体多祷告反省，求主加添信心，而他自己也借著省察、唱诗预备心灵，直到在主前清心，才开始求问。清心是指对所求问之事，放下自己的执著，并决意在明白主的旨意后要遵行到底。他常常清晨四点祷告，认为这时刻会更净心。有时需要几天的时间，甚至禁食才能预备好自己前去求问。每当他等候主，主总会借著经文、感动、平安、环境使他明白。求问主的过程，对他自己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不仅造就了他的灵性，也使他能与别人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主的真实。

难怪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环境，还能不陷入苦毒的深渊，反倒常常因主的同在而感恩。我从未听过他讲文革时的批斗、监狱里的艰苦、两会内的黑暗。若不是他留下来的教会历史回忆记录，我不会详细明白他走过的路。他总是与人谈论主和主的事，他会告诉我最近主给他的恩典和带领。我听他细算这些经验时，能感受他心里的感恩和喜乐。有时候别人似乎很难体会他的喜乐，因为主的亲密实在令他感到甘甜满足，他就自己唱起诗来，唱著唱著，自己越发感动了，而那些暂时的苦楚和世上的纠葛，也就不足介意了……

结语

李先生的过世，让我们很多人都为自己和教会难过，因为失去了一位属灵的父亲。他被神选召，为教会守望直到终老，是神爱中国的明证。中国老一辈的传道人，在神学建树和教会治理上并没有显赫的成就，但他们却像基督那样在肉身受苦，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坚忍到底。直到如今，中国教会仍然遭受著各种形式的逼迫，然而我们相信神为自己预备了许多这样忠心的传道人，他们不向巴力屈膝，不为名利，只专注于神国度的扩展。这些神重用的仆人，是中国教会的福祉，是神国的宝藏。



心怀大爱，敞开家门： 一位跨文化宣教士的故事

☞ 罗斯玛丽·米勒¹

1. 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罗斯玛丽·米勒，迄今仍然活跃于伦敦的宣教领域。她与 Serge 的 Southall 团队合作，致力于和住在伦敦的亚洲女性建立友谊，同时分享她的信仰。她是两本书的作者：《迈向自由：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赵郑简卿译；台湾改革宗出版社，台北：2009）和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New Growth Press, Greensboro, NC: 2012)。罗斯玛丽和她已故的丈夫杰克·米勒一起创办了新生命长老会教会，并创立了普世丰收宣教机构，现在称为 Serge。本文是编者雅碧对罗斯玛丽·米勒的访谈整理。英文版已经由她本人过目。

爱的种子：苦难中的礼物

1979年，当肆虐乌干达多年的血腥独裁者伊迪·阿明被赶下台时，我和先生杰克·米勒受邀前往乌干达。邀请我们的是当地的一位牧师，他曾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修，是杰克的学生。因为战乱带来太多人的死亡，许多年轻人无家可归，该牧师希望我们前去帮助他们。当我们到达乌干达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所有的商店空空如也，没有衣服，没有鞋子，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从街边的小摊上买到一些食物。而我们住的地方，虽然号称乌干达唯一安全的酒店，但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企图回国的流亡者、亚洲人和印度人。大家被困在酒店中，共同承担著物资缺乏、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惶恐不安，而友谊之花也就在彼此心中绽放出来。这段共患难、同甘苦的经历，不仅让我和杰克与这些曾经远在天边的人成了朋友，而且在我心中种下了对亚洲人和印度人的一份特别情怀，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他们当中时，颇有与故人重逢般的亲切与自然。

爱的呼唤：英国伦敦

杰克向来认为伦敦作为一个拥有三百个不同种族的国际性都市，是跨文化宣教的最佳禾场。单就我们所在的 Southall 小城而言，就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



兰卡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六万五千名移民。事实上，Southall 几乎堪称小印度，遍地都是印度服装、印度商店、印度珠宝、印度食物等。因受杰克的异象启发，我的女儿凯伦和她丈夫鲍勃在 1994 年就去了伦敦，希望在 Southall 向这些亚洲移民传福音。我们夫妇本来也想加入他们，但谁料杰克的心脏越来越弱，不久他便因心力衰竭去世。然而伦敦宣教的呼声并没有因爱侣的离世而消失在我心中，反而越来越清晰。可是由于家中有年迈的母亲和残障的妹妹需要照顾，我虽然心系伦敦，仍然无法全时间投入宣教的行列，只能每年抽出一段日子过去。直到十年前主先后接走了我母亲和妹妹，我才终于结束了英美两地来回跑的方式，拿到居英的长期签证，彻底在伦敦安了家。



爱的萌芽：友谊

搬到伦敦后，我和在那里开拓教会的女儿凯伦、女婿鲍勃住在一起。很快，我开始发现 Southall 的印度人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南印度，那是一个基督徒比较多的地区，可是这些人对信仰却总是避而不谈。他们似乎沉浸在生活的小圈圈内，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当时还没有哪家英国当地教会有特别针对他们的福音工作，而一直在很努力牧养他们的鲍勃，碰到这种局面，无疑就像被泼了一身冷水，透心凉：“我真的没法和一群对信仰漠不关心的人建立教会！”说实话，如何向这些人传福音？我自己也一头

雾水。不过，我这个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跟人交朋友。后来我了解到，印度教的有些信徒在厌倦了去庙里拜那些古代的宗教导师时，便会聚在一起，阅读当代一些导师的著作。于是我便采纳鲍勃的建议，带上自己所写的书《迈向自由》，去参加一个印度教妇女的聚会。聚会期间，一位坐在我旁边的印度女子，看到我书的封底上写着“当你厌倦了背负众多的责任感和内疚感……”，她忍不住地喊到：“哦！那是我！一点没错！”我便顺势邀请她：“好啊！你想了解多一点吗？”她不假思索地就回答说：“想！”。于是，我们就约好一起午餐，从此两人便成了好朋友。她是寡居，独自生活了许久，没有什么朋

友。我就花时间陪她，帮她整理账单和照片，时不时跟她讲圣经中的真理。友谊，为我打开了传福音的大门。

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交朋友，我们整个 Southall 的团队都在尽心尽力与那里的印度人建立友谊。为了能够接触到他们，我们开了一家慈善小店 MASHUP，即“希望和便利”之意。这个小店逐渐吸引了不少印度妇女。虽然刚开始时，大家对来买便宜货有点放不下面子，但慢慢就放开了。现在我们的店，从一家已经发展到五家——两家在伦敦，两家在郊区，一家在城北。此外，我们还在一个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小区，设立了一个“妈咪与宝贝”的亲子服务。很多穆斯林的妇女需要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她们的婴儿。我们便在她们抽不出空带孩子的时候，提供饮品和讲故事的活动。这样，这些小小孩在上托儿所之前，便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起玩耍。这种小区服务，不仅为我们创造了接触这些印度人的空间，还在我们中间搭起了一个个珍贵的友谊桥梁。

爱的大能：信靠圣灵

友谊帮助我们跨越文化的差异，并与人建立关系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信靠圣灵打开他们的心扉了。例如上文提到的那位我在读书会上遇到的印度女子，后来我问她：“Swami，你们的宗教导师真的帮得了你吗？”她的回应是：“帮不帮得了是

一回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就得每天读他们写的东西。”虽然她不明说，但我看得出来，这种阅读并不能满足她；相较起来，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更能带给她生命的滋养。于是，我将我写的书以及关于我女儿浪子回头的书《回来吧，芭芭拉！》介绍给她。Swami 的反应非常积极，她希望我读给她听。之后，她就真的坐在我脚边，听我读完了整本书，也由此听到了福音！而一旦她的心向神敞开了，我们就开始一起学圣经。

我们自己的心也要随时向圣灵开放，信靠祂会给你合适的话语传福音。有一次我住院，与另一个女病友同处一室。我和她之间的窗帘大部分时间都是拉上的，彼此难得见上一面。某天早晨，我求主打开窗帘，让我有和她说话的机会。祷告完不久，护理人员便唱著歌，很阳光地走进屋，我心中大喜：“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趁她打开窗帘时，我便拄著助行器，移步到这位病友的床边，对她说：“我差点病死了，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就是这样一个开场白，让我得以向她传福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另一次是一个料峭的冬日，我在伦敦寓所附近的街上散步，隔壁的孟加拉国邻居向我招手，要我去他跟他聊聊天。这位男子来自孟加拉国，他非常喜欢我们家，特别是得知我有个孟加拉国的孙媳妇后。我走过去，他拿出一个会旋转的钢琴凳给我坐。可是我一坐下，便呼地一

声被转到了地上，把站在一旁的他吓得惊叫起来。虽然我毫发无损，不过看他吓成那样，我就趁势将稍早问医院病友的那个问题抛给他。由此我又得到了跟他传讲福音的机会。

爱的果实：敞开家门

对我而言，跨文化宣教就是走出我习惯的美国文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有著几千年的历史，非常悠远壮阔，但也带给人沉重的包袱。比如尊重和荣誉——这是印度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一个来自非严格印度教家庭的人来说，这就意味著，要成为基督徒，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人会被整个家庭拒之门外，承受著难以想象的贬损和羞辱。他们必然需要圣灵来预备他们的心，给他们勇气和胆量，来承担声誉俱毁的风险。相应地，拥有一个在爱中陪伴他们、分享他们重担的基督信仰群体，对他们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的女婿鲍勃在 Southall 的教会讲道时一直强调“我们要在热情好客、分享自己生活的氛围中传讲福音”的原因。印度人对自己的社群非常有归属感，要他们主动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群，简直难如登天。因此，鲍勃提出“归属和归心”的传福音精神，号召大家向我们所服事的印度人群开放自己的家。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常有意邀请印度人来我家玩，参与我们的家庭活动，如庆生和欢度

佳节。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每年都邀请整个教会一百多号人来家里庆祝美国人的感恩节。人挤人，热闹得很，也难免会发生家用器物被打破、损坏的意外。但东西打破了，大家彼此之间的隔阂也随之打破了，一个爱的基督信仰群体因此逐渐形成。

在个人的属灵层面，敞开家门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去接待众人。为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骄傲，免得看自己比别人强。敞开自己的家门，也意味著你向群体完全地开放自己，随时待命，甚至在半夜被叫去接生。我的女儿凯伦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她确实会放下一切去助人所需。当然，敞开家门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小家，也包括我们团队这个大家。我们团队在 Southall 的房子，就是向所有需要帮助之人开放的家，包括那些流落街头的人。现在就有一对穆斯林夫妇和教会的一位长老住在那里。这个房子就像一个旋转餐厅一样，人进人出，来来去去。房子里有书桌，大家围绕桌旁，有人传讲福音，有人响应福音，常常会激发出颇有成效的属灵交谈。久而久之，凡来到这个家里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而他们又归属于教会这个更大的信仰群体。

爱的挑战：属灵争战

在圣灵的浇灌下，我们在 Southall 的团队开始品尝到福音所结的美好果实。然

而，我们不要忘了，宣教工场也是一个战场。恶者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用各种方式阻碍神的工作。其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制造纷争，破坏宣教团队的团结。我们在 Southall 所植的堂中曾有一位领袖，他妻子喜欢与我谈心。我们常常一起喝咖啡，一起祷告，成了好朋友。但某天，他们夫妇突然向鲍勃翻脸，提出一项又一项莫名其妙的指控，严重诋毁他的声誉。鲍勃努力和他们沟通，试图澄清真相，但都无济于事，而且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陆续卷入其中。最后，我们的差会 Serge 不得不介入。结果是这对夫妇离开了，完全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我就此失去了一份珍贵的友谊，心里非常难过，也由此领略到骄傲——无论是自以为是，还是山头主义，或是以自己的出身为傲等，所带给团队的破坏是何等可怕。可见一个好的基督徒领袖必须存警醒的心，常常留意在心中冒出来的骄傲，并要即时悔改，从中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遗憾的是，不少坚持上教会、甚至参与教会服事的基督徒，已不再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活的焦点，

不知不觉中就步入了魔鬼的圈套，任自我不断膨胀，直至失控。为此，我会鼓励他们从圣经中选一本书卷，反复阅读二十五遍，直到神的话语深扎于心。我们切要谨记，我们不是与血肉之躯作战。当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时，圣灵就能帮助我们靠神话语的大能击退敌人。

魔鬼的另一个伎俩，是使将人的心思意念蒙上脂油，拦阻他们向圣灵开放。就像在我们举办的一次福音餐会上，受邀的十七位年长的印度妇女一坐下来，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谈起穆斯林文化中的小恶魔来，大家越谈越兴奋，话题也越扯越离谱。坐在一旁的我只能默默地祷告：“主啊，请赐给我向她们传福音的机会！”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当我大声宣布说：“暂停一下，女士们！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谈话突然停止了，大家都安静地转向我。于是，我给她们讲了福音书中耶稣赶鬼医病的故事。那天晚上，餐会以祷告结束。午夜时分，一位妇女打电话过来，说：“我出席了今晚的餐会，听了你讲的故事。我的女儿就



是被鬼附了！请来帮助我们！”看，神多奇妙！当时，我们正好也在举行“来伦敦传福音与祈祷”的年度宣教大会，有一百多位从美国各地前来的与会者。第二天，我将这位印度母亲的求助转达给了大家，并向他们发出邀请：“今天我会去她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最终，有四个人和我一起动身。当我们走进这个家庭，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昏迷在床上，我们就围著她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祷告后，似乎没有任何动静。我便问这位印度母亲：“你家里藏了什么不洁之物？”她就拿出一大袋有关与小恶魔交流用的东西来。我们就帮她拿出来扔掉了。不久后，这位年轻女子开始有所改变。我们团队的一名成员成了她的朋友，带她去教会，帮她处理一些思想和情绪的问题。她甚至后来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六七个月前，我还在教会见到了她。她仍然有很多问题，但至少头脑清醒了很多。

爱的武器：谦卑

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指出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这场属灵的争战，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意味著，如果你试图凭借各种既定法则、方式方法来抵挡恶魔，是绝对行不通的。得胜必须从谦卑开始。而承认自己的软弱，乃是谦卑的第一步。你要对主说：“这是我想做的事，但我没有知识、智慧和能力。如果这

出于你的呼召，求你成就！”事实上，神的确会成就祂的旨意。这是杰克和我多年来所学会的功课。谦卑，也意味著不单独作战，而是请别人与你一起祷告并为你祷告。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祂的应许，即当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时，祂就在其中。在Serge，祷告会已经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中。因为大家都清楚，靠自己根本无法完成神所交付的使命，所以每个人都愿意向彼此敞开心扉并请求代祷。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也请求众教会为我们祷告。借助祷告，主就将我们的软弱转化为刚强。

在跨文化宣教的服事中，谦卑尤为重要。我从小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德国文化中长大，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惯。这使得我多年来，与基督的关系一直停留在安分守法的层面。就在我自以为做基督徒做得还不错时，神开始揭示我里面根深蒂固的罪性，让我发现自己所是与所做的不一致。然而，就算有了这种认识，我也无法改变自己，只能谦卑地祈求从上而来的救恩。我个人的得救经历不断提醒我，在向同样浸淫在严守律法的文化中的穆斯林传福音时，需要神赐我一颗同理心，能够设身处地，体会他们所受的捆绑及难以自我突破的局限，而不是认为自己比他们好。谦卑也使我们能够发现和欣赏不同文化中神所赐的美好。比如印度文化对家庭和互相关爱的重视，特别令我感到亲切，因为我自己也拥有一个关系亲密的家庭。大家总是一起欢庆彼此的喜事，但我们并

不是关起门来庆祝，而是敞开家门，欢迎其他人与我们同欢乐。我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家门大开、时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光顾甚至同住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总之，每个文化中都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是神的普遍恩典，我们在传福音时无需完全否定掉。

爱的祝福：富足人生

身为一名宣教士，我深感自己富比王侯。我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虽然他们的肤色、种族、文化背景与我有异，但友谊跨越所有鸿沟。我在伦敦的生活因为行动不便而常常足不出户，在我陷于被困的苦恼时，我就打电话给两位特别的印度朋友，问她们：“你们会为我祷告吗？”她们会立即停下手中的事，为我献上最甜美的祈祷。我也有一个富足的家庭。我

有二十四个孙子和五十八个曾孙。当我女儿在 2023 年为我举办派对时，总共有七十四位后辈。我的孙子中有四个是在伦敦的宣教士，一个在加尔各答。他们当中又有三个与其他族裔的人结婚，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大家庭。我承认，生活中依然有很多挑战，但我真的是福杯满溢。我现在九十九岁时还在伦敦宣教，这令我感觉自己富可敌国。虽然我在情绪低落时也会自我怀疑，认为也许一生的服事就到此为止了。但主总是对我说：“去！”过几个月我就是百岁老人了。最近，我向 Serge 的前董事会主席坦诚讲出了我心中的忧虑：“我的精力和能力都不如前了，你们还会要我吗？”他的回答令我泪流满面：“萝斯玛丽，我们很荣幸你仍然愿意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爱你！”哦！我的天父，谢谢你的鼓励！



附：给中国基督徒的一封信

致中国家庭教会的朋友们：

中国福音会的雅碧姐妹和我一直保持联系。透过她，我感受到了神对中国教会极深的爱和负担。据雅碧所述，你们当中有些人渴望向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分享福音。这太棒了！

从以上的故事中，你们可能对我有了一些了解。我已经 99 岁了，仍在伦敦的南亚小区中，以我有限的体力和能力服事基督。这么多年来，我稍稍积累了一些跨文化宣教的经验。

服事这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地的亚洲人，我发现了解他们的文化很重要。而这需要时间。这就意味著我要有一颗谦卑心。他们和我如此不同，我需要圣灵先打开我的心，然后相信祂所定的时间。为此，我必须将骄傲拒之门外，谦卑自己，单单相信上帝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需要让福音深入骨髓，以便我向人传讲福音时，不是出于作基督徒的责任，而是发自内心深切的渴望，要与人分享这位拯救我这个破碎生命的基督。

雅碧还告诉我你们当前的苦难。请允许我用彼得在他信中的话语与你们共勉：

“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前四 16, 19；和

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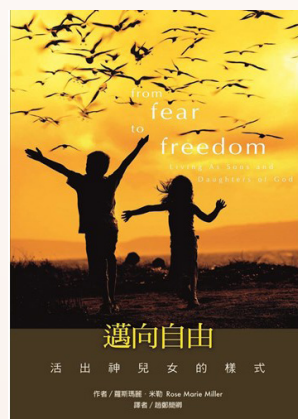
我自己也曾若干次面对死亡。一次是在乌干达，当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我家时，我丈夫开了门，邀请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居然奇迹般地同意了，而我们因此得以存活。另一次是若干年后，我 95 岁时，在伦敦病得快死了。医生几乎要放弃对我的治疗，但在我女儿和孙女竭力恳求之下，他们勉强为之，而我居然挺过来了。

但我们并不是每次都仅与死亡擦肩而过。我丈夫没有在心脏手术中幸存，而是被神接走了。我的两个孙子也因著癌症对身体的重创，在十天内相继去世。

我的书《迈向自由》已译成中文，可以从台湾的改革宗出版社购买。这本书讲述了我生命中十年的苦难历程，及这些遭遇如何深化了我对自己和神的认识。

向你们这群我素未谋面、但将在永恒荣耀中相见的弟兄姐妹，献上我诚挚的爱与祝福！

罗斯玛丽·米勒



《福音！文化！国度！》

征稿启事

一、宗旨

本季刊以探索“三化异象”在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中落实的策略和方式为主要内容，第一年不定期出刊，欢迎海内外教会领袖、富有第一手中国宣教经验的宣教士、研究人员、神学教育工作者和教牧同工、及中国教会差派在海外的宣教士或营商宣教的职场专业人士投稿。如果您是对“三化异象”深有体会的信徒，也十分欢迎您来稿。

二、征稿的内容

1. 中国福音化层面：多方位对中国百姓的生活和生命，尤其他们的心灵状态、群体意识、心灵创伤的研究，探讨如何将福音化从外在社会层面深入到心灵的医治与更新。
2. 教会国度化层面：分享中国教会及普世各地各宗派、教会在牧养、宣教、神学教育等各种事工中的经验、挑战和探索；反思并觉察中国传统文化和党文化如何影响著中国教会治理的理念和运作，并透过认识圣经文化来寻求文化重建和更新的路径。
3. 文化基督化层面：厘清“中华文化基督化”与“基督教中国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三、稿件的要求

1.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须为作者本人之首次发表，且未曾部分或全部刊登于国内外其他刊物。
2. 来稿以中、英文发表为主，字数五千字以内。
3. 请提供电子档案（Word）及著明中文 / 英文篇名，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简介。
4. < 撰稿格式 > 烦请电邮索取。
5. 由于本录用中英文双语发表，故作者投稿经本刊录用后，除非作者自行提供中文版原稿，否则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为大作翻译中文或英文。本刊为了广为推动“三化异象”，因此本刊提供网络下载服务，若您的大作不同意上网供读者阅读下载，烦请事先告知本刊，以便本刊合宜处理。
6. 本刊不负责来稿内容之著作权问题（如图、表及长引文等），请作者先行取得著作权持有者之同意；来稿请勿发生侵害第三人权利之情事，如有抄袭、重制或侵害等情形，概由投稿者负担法律责任，本刊不负法律责任。
7. 凡录用稿件，当致薄酬，故本刊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权，本刊享有著作财产权；日后除著作者本人将其个人著作结集出版外，凡任何人以任何目的之翻印、转载、翻译等皆须事先征得本刊同意。
8. 来稿请投：Journal@chinaministriesinternational.org



惟愿神至圣的尊名在那片被称为神州的大地上，
被高举，被尊崇，得荣耀！